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Cultural Codes and Symbolic Performance

中央银行独立性： 文化密码与象征表现

卡洛·托尼亚托 著
(Carlo Tognato)

王佐发 译



中国金融出版社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Cultural Codes and Symbolic Performance

中央银行独立性： 文化密码与象征表现

卡洛·托尼亚托 著
(Carlo Tognato)

王佐发 译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仲 垣

责任校对：张志文

责任印制：裴 刚

Copyright© Carlo Tognato, 2012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by Carlo Tognato.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北京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15 - 6205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中文简体字版权由中国金融出版社所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央银行独立性：文化密码与象征表现 (Zhongyang Yinhang Duxing: Wenhua Mima yu Xiangzheng Biaoxian) / (美) 卡洛·托尼亚托著；王佐发译.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 1

ISBN 978 - 7 - 5049 - 9276 - 5

I. ①中… II. ①卡…②王… III. ①中央银行—研究 IV. ①F830. 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3166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尺寸 169 毫米×239 毫米

印张 13.75

字数 190 千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ISBN 978 - 7 - 5049 - 9276 - 5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序 言

经典与现代社会学理论把资本主义市场概念化为对人性去魅的绝佳体现，这种去魅的标志是现代性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理性化定性。本书有力地挑战了这一核心思想，提供强有力的案例说明即便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中心里，文化仍然继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卡洛·托尼亚托（Carlo Tognato）转向“强烈程序”文化社会学，旨在表明含义、神秘和戏剧是中央银行合法性的关键，保持合法性对中央银行在困难时期保持经济灵活性至关重要。

在货币事务领域把“稳定文化”理论化的同时，托尼亚托提出，为了保持独立性，央行应该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集体认同的中心。这样，普通公民把央行的经济建议视为为保护其神圣的社会价值而做出的努力，而不是一种经济策略。当经济体陷入危机时，央行就会演出一部社会剧，似乎是专门为了执行其神圣的使命而上演的。

托尼亚托用这种新的理论模型对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三家央行，即德意志联邦银行、欧洲中央银行（ECB）以及美国联邦储蓄银行（The Fed）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德意志联邦银行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奇迹，它获得了一种象征性权力，这种权力把它提升到近乎于救世主的地位。相反，欧洲央行的地位就低得多。欧洲各国的集体认同更弱，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教训更复杂，使得欧洲央行在面对可能导致欧洲经济削弱的欧洲危机时束手束脚。相比之下美联储在融入美国梦的核心价值观上的成功使得其有能力打开货币政策的“水龙头”。

本书继续着经济社会学领域里的文化转向，使得经济社会学的核

心与市场逻辑之间的联系比以往更加紧密。这是一本兼具理论想象力和丰富经验资料的著作，它与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所面对的危机高度相关。

杰弗里·C. 亚历山大

(Jeffrey C. Alexander)

致 谢

本书的撰写是一次长途旅行，当旅行到达终点的时候，我已经累积了很多感激之“债”，我要向很多货币事物领域的学者和从业者、同事和朋友表达我的感激。

当我在米兰博科尼大学（Bocconi University of Milan）读本科最后一年时，斯蒂法诺·查马妮（Stefano Zamagni）让我自由地发挥我的学术好奇心，并耐心地忍受我的不成熟。

后来，当我在安科纳大学（University of Ancona）读经济学研究生时，与安东尼奥·卡拉法蒂（Antonio Calafati）的交流让我获益匪浅。

当我在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哲学硕士时，我的导师埃里克·塞德曼（Lars - erik Cederman）和奈瑞·伍兹（Ngaire Woods）给我提供了难以言表的精神鼓励。我也对埃里克允许我追随他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学习深表感激。没有这些因缘际遇，本书根本不可能问世。

1999年冬天，到达加州之后，我遇到杰夫·亚历山大（Jeff Alexander）并见识到他所做的工作。这次邂逅成为我学术生涯的分水岭。我对杰夫的思想以及他对我多年来的持续支持深表感激，没有这些，本书根本不可能成型。

1999年春天，我遇到苏珊·罗曼（Susanne Lohmann）。没有她在UCLA期间以及之后几年的鼓励和慷慨支持，我不可能在我学术生涯的十字路口——在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社会学中间进行选择的时候——选择我当前的研究领域。我要为此向苏珊表达深深的谢意。

我在UCLA做博士论文期间也得到维克多·沃尔芬斯坦（Victor Wolfenstein）、邵·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änder）和德宝拉·拉尔森

(Deborah Larson) 的支持。

2001 年 1 月到 3 月，德意志联邦银行研究小组接待我做调研。我对此尤其感谢汉斯·海尔门 (Heinz Herrman)、沃尔夫·冯·卡尔克洛斯 (Ulf von Kalkreuth)、约吉姆·凯勒 (Joachim Keller) 和简恩·塔秦 (Jens Tapkin)。我还要对卡罗拉·高慈 (Carola Goltz) 在我在联邦银行档案室做研究期间对我付出的时间和关照表示谢意。我在联邦银行研究期间还与本·克莱克 (Ben Craig) 进行了交流，他那时正从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到这里访问，后来当我返回法兰克福的时候他接待了我，他的友好让我无法忘怀。

从 2001 年夏天到 2002 年夏天，我几乎整整一年都在康斯坦茨大学 (University of Konstanz) 社会学系度过。我在那里参与本哈德·吉森 (Bernhard Giesen) 的一项研究工作，并继续为我的博士论文做调研。这是我第一次同一群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一起工作。尽管我表现得很差，本哈德还是很慷慨地给我提供展示的机会。回首那段特别的机遇，我可以确定地说本哈德的慷慨和耐心都是独一无二的。

2003 年 7 月到 11 月，也就是我向 UCLA 提交博士论文之后不久，我拜访了波哥大哥伦比亚联邦银行的机构通讯部和经济研究部。我非常感谢米格尔·乌鲁蒂亚 (Miguel Urrutia)、乌里伟 (Jose Darío Uribe)、菲尔南多·腾蛟 (Fernando Tenjo) 和所罗门·卡曼诺维茨 (Salomón Kalmanovitz) 接纳我到他们的部门。

之后，我在波哥大定居。2004 年到 2006 年初，我不得不中断对央行的研究。2006 年末，当我在哥伦比亚国立大学谋到一份社会学研究工作之后，才得以恢复我的研究。哥伦比亚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学研究中心的某些了不起的同事和朋友们的支持使我得以重新回到研究轨道。我想特别感谢尤里·杰克·戈麦斯 (Yuri Jack Gómez)、阿里克西斯·德·格列夫 (Alexis de Greiff)、米利安·吉麦罗 (Myriam Jimeno)、弗朗西斯科·奥特佳 (Francisco Ortega)、奥尔佳·雷斯特雷波 (Ogla Restrepo)、贾维尔·萨恩斯 (Javier Saenz)、费边·萨纳布里亚 (Fabián

Sanabria) 和保罗·维格诺罗 (Paolo Vignolo)。后来塞巴斯蒂安·库拉尔 (Sebastián Cuellar) 加入进来。再后来, 随着塞巴斯蒂安去波哥大, 马尔科姆·阿什莫 (Malcolm Ashmore) 加入进来。

可能是 2008 年我对耶鲁的一次访问时, 菲尔·史密斯 (Phil Smith) 喝咖啡的时候问我是否有兴趣参与撰写他联合编辑的一本书《牛津文化社会学手册》(Oxford Handbook of Cultural Sociology) 中的一章。这个机会使得我把本书的理论水平线定义得更准确。此后几年里, 菲尔一直极其慷慨地回复我提出的关于本书的问题。自从我认识他以来, 他的支持对本书的完成起了关键作用。

在过去的几年里, 爱德华多·德拉封迪 (Eduardo de la Fuente)、彼得·墨菲 (Peter Murphy) 和布莱德·韦斯特 (Brad West) 也在很多方面支持我, 我应该向他们表示谢意和感激。

我重新定居澳大利亚之后, 阿德莱德大学的亚太治理研究中心和历史与政治学院为我完成本书提供了支持。我尤其对卡尼西卡·贾亚苏里亚 (Kanishka Jayasuriya)、丽萨·黑尔 (Lisa Hill)、安德鲁·罗塞尔 (Andrew Rosser) 和克莱门·麦金泰尔 (Clement Macintyre) 表示感谢。

回到 UCLA, 我的两位同学艾利夫·艾尔沙德 (Arif Arshad) 和苏莱曼·阿里 (Suleyman Ari) 在我每次需要回到西屋和我的委员会见面的时候都接待我。而且我在牛津的前学院伙伴杰西卡·赛克 (Jessica Sack) 在我每次造访纽黑文的时候都敞开了她所在的系的大门迎接我。我对他们的好客与友好表示感谢。

没有我家人的支持, 本书绝对无法完成。我把本书献给我的女儿马尔蒂娜 (Martina)、妻子亚历桑德拉 (Alexandra)、我的母亲赛拉丽娜 (Cesarina) 和父亲马里奥 (Mario)。

前言

1999 年，欧洲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欧盟诞生了。十一个国家放弃了它们的主权货币，采用欧元，并把其货币主权上交给欧中央银行（ECB）。当时，欧洲货币联盟（EMU）似乎实现了很多欧洲人长期以来的梦想。EMU 承诺用当前和未来的合作与稳定代替历史的战争和仇恨。它发誓战胜民族主义“恶魔”，代之以在和平与善意的基础上建立共享的原则，用这些原则建立共同体。当时，欧元作为“现代欧洲的第一座大教堂”^①横空出世，作为历史上开启新篇章的基石而受到致敬：“当耶稣基督决定建立一座教堂的时候，他对彼得说：‘你就是彼得，我将在这块石头上建立我的教堂。你就是欧元，我们将在欧元这种新货币上建立我们的新欧洲’。”（Issing, 1999a）

为了保护这座货币教堂，EMU 的奠基者们创建了一家中央银行，这家银行至少在纸面上看上去比世界历史上最独立的银行，即德意志联邦银行更独立。

规范 ECB 的法律条文和 ECB 所嵌入其中的背景制度语境都似乎支持该预期。但是，很多分析者很快就告诫，现在下结论认为 ECB 将比德意志联邦银行更独立于政治干预还为时尚早。后者毕竟可以依赖地方稳定文化获得公众的支持，而 ECB 却做不到。现在，学者与从业者都感觉在合法性、公众支持与央行独立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并猜测文化可能与此有某种关联。只是，目前为止尚未有支持此直觉的研究。

十年后，EMU 就蹒跚着迎来了其历史上第一个可能从根本上考验其生存能力的挑战。希腊债务危机燃起一把大火，大火最终烧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大火带来的冲击不仅在整個欧盟内部蔓延，而且扩散到欧盟之外。过去，全球债务危机的一般解决办法是进行大规模的结构

调整，并辅以严重的货币贬值和更激进的出口导向政策。但是，因为在这一次欧洲的事件中陷入困境的国家是同一货币联盟内的成员国，所以，不能采取货币贬值。结果，公共政策和国内工资都将为任何调整结果埋单。

如果金融市场把要求希腊进行的矫正措施强加给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在雅典街头不断上演的暴力抗议就可能将在里斯本、马德里和罗马街头上演。为了获得成为 EMU 成员的门票，并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这些国家的人民经常被要求承担巨大的牺牲。今天，他们承担这些成本的意愿降低了。最近的经济萧条，加上之前经常发生的多年的经济缓慢增长、高失业率和大规模的公共债务负担，已经使得通过扩大公共开支刺激增长的可能性变得极为渺茫，也已经给南欧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只要当地的社会结构阻塞了新一代的社会流动预期，情况就会变得更糟糕。如果忠诚与社会归属感能够压倒才华优点而得到奖赏，那么因为人们不再预期自己会因为个人做出的牺牲而赢得一份果实，构成经济调整基础的隐含的社会契约将开始解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社会将面临滑入一个恶性循环的危险中，循环的结局可能是希望凋零，绝望上位，使得宏观经济调整变得更困难。市场可能对此有所预期，并因此对公共债务施加额外的溢价。此时，对利益提供服务的成本变得更加高昂，以至于有必要采取更大的矫正措施。

对付债务危机不仅只对南欧国家构成令人生畏的挑战。在欧盟的另一端，纳税人眼见他们部分缴纳的税金流入南方去拯救陷入困境的经济，旨在稳定整个欧元区。右翼党派看到了利用其愤怒的机会，地区领导人则在保卫欧元免受民族主义攻击中面临越来越艰苦的局面。

债务危机使得 ECB 面临三个重要的挑战。第一，只要需要执行激进的经济矫正措施来应对危机，就需要把经常愤怒的普通公众拉回到自己一边。第二，它必须使其他地区的公民相信提供现金稳定欧元的措施是正当的。第三，一旦任何陷入困境的国家债务违约，ECB 可能不得不把

部分债务货币化，以便对那些欧洲金融机构，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那些可能因为债务违约而风险过度暴露的金融机构进行再融资。这种举措模仿了美联储在美国金融危机期间为维护银行系统稳定所做的工作，但是，可能会疏远中北欧的公民，因为他们对任何通胀的前景都发自内心的厌恶。所以，ECB 需要说服他们特殊情况需要特别措施；而且，即便这样，ECB 也会坚持其价格稳定的承诺，也不会对任何政治干预屈服。

面对这些挑战，理解合法性、公共支持和央行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一项有价值的资产。目前为止，学者与从业者本能地认为文化可能与央行独立性有关，他们甚至创造了一个概念，即稳定文化，用来表示这种关联性。但是，他们对稳定文化的理解仍然很肤浅，而且经常仅仅是同义反复。换句话说，稳定文化只不过是有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文化。如果不是这样，则稳定文化就坠入一种特殊情况，即通胀文化，在此文化下公众价值和态度支持低通胀。结果，独立的央行会更容易控制通胀，因为在这种社会环境里人们更愿意接受紧缩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牺牲。

但是，这种对稳定文化的理解，它所揭示的远远小于其所掩盖的。早在 1998 年，当时的联邦银行法律事务部主任贝尔托德·华里西（Berthold Wahlig）就强调公众的渲染在货币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只要央行与政客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发生冲突，每一方都可以选择渲染冲突，以便赢得公众对自己的事业的支持。当然，普通公众在选择支持银行或者其对立面时，他们对低通胀的偏好以及对央行独立的态度都起到重要作用。即便如此，对货币事务的渲染还是比仅仅通胀偏好和态度起的作用要大。但是，学者和从业者在解决文化在货币事务中的作用时，这些已经完全落到他们所采取的分析方法之外。

要领会稳定文化的本质和运行，学者们必须细致地观察货币事务被渲染之后会发生什么。此时，货币游戏会奇怪地转变成一场关于集体认同的道德剧，而且央行独立性转变成一种关乎社会根基的事务。此时，稳定文化就反映出其真实本质，即这是一种文化结构和实践，他们有可

能使得货币事务在含义上实现转型，使得央行独立性对普通公众呈现出一种先验的价值。

为了捕捉到这些现象，我们需要超越当前对稳定文化研究的社会心理学方法，承认文化不仅与价值和态度有关，而且与符号、密码、叙事、流派、公共惯例和社会戏剧有关。本书将提供一个分析框架，使得分析者能够看到这些因素在起作用。本书尤其要向学者和从业者们指出构成稳定文化基石的三个重要因素：一个社会了解自己的方式、可能把货币事务绑定在集体认同上的象征联系以及为这种联系产生作用提供基础的戏剧条件。

如果进一步深挖稳定文化的本质和运行，我们会理解为什么公众对通胀的偏好，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中央银行独立的态度并非一定由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只要货币事务走出经济计算的领域，进入国民认同层面，公众对通胀的偏好就成为公众对国民认同的偏好的衡量标准。结果，货币事务对价格稳定有利的事实或许反映出这种转型的意义。

一旦我们揭示了稳定文化的复杂性和令人着迷的工作方式，就容易理解稳定文化与经济状况之间关系不大的原因了。许多经济学家和货币领域的从业者误以为如果中央银行能够保持通货膨胀处在较低的水平，且人们也能理解价格稳定很重要的话，公众就会自动捍卫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经济状况既不是保证实施且有稳定倾向的货币政策的必要性，也不是充分条件。相反，把价格的稳定转化成社会的先验价值便已足够。

要掀开稳定文化的盖子，分析者必须承认学者和从业者们迄今为止系统性地忽略了货币事务中文化交流的全部世界。传统上，人们把央行独立看作是最纯净的现代理性制度的蒸馏物之一。然而，对货币事务的技术解释并非其在公共领域的唯一形象。正如一位对这种现象的罕见的观察者所言，战争、生死、健康、出生与童年、物理与技术、海洋、运动、建筑、婚姻以及“众多的宗教隐喻”提供了替代性的表述场域，在此场域内讨论货币和央行事务。（Scherbacher - Posé, 1999）当宗教隐喻、起源神话、秋天的童话以及罪恶与救赎的教义开始用来表述货币事

务时，货币与央行业务就走出冷漠呆板的经济计算领域，进入其他的领域，遵循其他的文化逻辑。此时，央行可能变成社会的道德指南针，通胀可能成为社会的道德深渊，而货币稳定可能成为社会生活重新道德化的路径。有些人提醒我们社会自我净化必须经过一个“眼泪之谷”。（Knapp, 1991）其他人强调“货币政策必须带来伤害”，（Reinmann, 1989）而更有人坚持认为接受经济牺牲具有比经济学家可能让我们所相信的更深刻的意义：“幸福与痛苦的区别是 GDP 赤字的 0.2 个百分点！2.9% 的赤字是好的，可以让我们活得幸福美满，而 3.1% 的赤字可以让一个国家陷入混乱、痛苦和永远的诅咒。”^②随着货币事务渐渐地陷入道德领地，中央银行家们逐渐被抛进一个充满教义、教堂和虔诚的世界。某些评论者开始把主要的中央银行家称为教皇^③或红衣主教，认为他们“都理念纯洁且神圣得刻板”。（Glottz, 1998）其他人强调中央银行对其使命的完全投入：他“为货币政策生，为货币政策死”。^④还有其他人强调央行家职业的苦行僧特点。（Arkins, 2009）

货币事务除了具有如此道德表现之外，我们也看到货币与中央银行业务进入了国民认同领域。这种情况在德国马克上经常发生。很多研究者把德国马克视为国家象征，德国人唯一值得骄傲的东西，（Bonfante, 1998: 21）一种给予德国人“一丝认同感，甚至在国徽和国旗出现之前就有的认同感。”（Kohl, 1998: 632）很多观察者把德国马克的神圣性质与欧元的世俗特性进行比较。即便对欧元来说，各种分析者已经强调其承载的意义不仅仅限于经济功能。他们指出，欧元也具有超越金融信息的意义。（Perez, 1999: 140）例如，当时欧央行的行长魏·杜森博格（Wim Duisenberg）在欧元正式在欧元区实际流通的前夜就十分清楚这一点：“人们不愿意让中央银行家表达情绪或者拥有梦想。人们希望他们讲数字，并用数字思考。今天请允许我指出一个例外。现在是历史流转到今天的时刻。”（Duisenberg, 2001a）

正当欧洲货币事务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期时，在这样的历史时刻系统地研究稳定文化尤其必要。但是，其相关性已经超出了欧洲范

围。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独立的央行业务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个过程到 90 年代达到顶峰，90 年代前五年就有至少 30 个国家增加了保护央行独立性的法条。此后，世界范围内的很多中央银行家努力把本国朝向宏观经济稳定的方向推动，当然，期间也经常遇到公众的阻力。这些中央银行家感受到央行缺乏其工业化世界的对手可以依赖的一种公众的支持，于是某些银行家决定作出某些努力，采取某些步骤激励当地稳定文化的生成。本书提供一个分析框架，以便让人们理解为什么稳定文化可以做得很好，以及如何让稳定文化做得更好。最重要的是，本书为世界范围内的中央银行家提供工具，用更专注和有效率的方式生成并加强本地的稳定文化。

认识到把货币事务转化成国民认同问题是任何稳定文化的基石后，放大并聚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变得很重要。一旦经济遭到特别的冲击，央行必须放松货币政策。政治经济学家已经证明在这些情况下央行的特别回应措施会被视为具有正当性，央行的信誉不会受到影响。（Lohmann, 1992）但是，特殊情况根本不是不言自明的。如果分析者花费这么长时间才发现美国正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为什么要求公众在发现危机上更有效率？所以，问题是如何认定一种情况构成“特别”。如果经济数据是不言自明的，那么为了证明宽松货币政策的正当性，中央银行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观察者只要援引客观摆在那里的经济形势就行了。但是，最近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却证明事情远非如此。相反，人们在谈论经济形势的时候，不断地重复这些表述：战争、对文明的威胁或者毁灭。比如，《经济学人》杂志就把金融危机顶峰时期描述为“一场核冬天”的前兆。^⑤财政部部长鲍尔森警告说危机是“金融上的战争”。（Stewart, 2009: 74）财政部长盖特纳后来补充说“美联储更像五角大楼，它保护美国公民的自由与安全免受实际存在的威胁。”（Grunwald, 2009）这种使用有力的表述，而且经常放在夸张、恐怖和悲剧性的框架下的表述，表明在制造特别情况的过程中掺杂了很多文化工作。正是因为做了这些工作，才使得公众不再把宽松货币的举措视为

对社会的威胁，而是视为挽救社会所必须做的工作，因而扭转了稳定文化下本来应该适用的逻辑。这种对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特别情况的文化规范构成文化现象的另一个有趣的维度，本书也将对此进行探讨。

从概念上分析，本书试图回应实际需求。文化在独立央行运行中的作用在传统上游离于学院派政治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家的政策控制的分析能力之外。创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使得在央行独立的分析中能看到文化因素并对之进行干预，这将有助于央行独立运行在工业化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为了执行此项任务，我求助于社会学并作为导向。但是很快，我无意中发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相当多的社会学者传统上相信经济是现代社会生活中最不抱幻想的领域之一。更近的时候，经济主义学里的一批文化主义学者坚持认为技术原因并没有成功地把文化从市场领域剔除出去。相反，文化积极地参与塑造经济行为，甚至使之可行。即便如此，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仍然把分析视野限定在统一的制度场景。相反，稳定文化研究要求对货币场景与构成货币制度运行基础并最终定义社会的集体认同的中心神话和仪式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探索。20 世纪 60 年代的功能主义者尽力把分析朝着这个方向推进，但是，他们的价值社会学的分析视野无法让他们领会神话和仪式在经济生活里的作用，这是过去二十年里新杜尔克海姆社会学派一直尽力解决的问题。当我转向新杜尔克海姆文化社会学寻求指导时，事情马上变得很清晰了：经济文化社会学仍然有待于在那个理论传统框架内进行系统的描述。这样做会给我一个机会对理论焦距的轮廓进行清晰的界定，然后，通过这个理论镜头，我可能解决稳定文化现象。

第一章解决这个问题。过去三十年里，在经济社会学者寻求把文化分析纳入其自己的探索领域时，一个问题推动着他们中间的争论：在研究经济现象时，文化分析应该取代社会结构分析吗？或者，前者应该补充后者？因为争论所聚焦的范围太窄，以至于妨碍了社会学者系统地讨论他们应该怎样解释经济生活的文化维度，以及他们应该把经济活动的

文化嵌入分析推到多远？我在本章指出，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构成经济的文化社会学的核心；我还展示经济的文化社会学如何从所谓的文化社会学健康方案里脱颖而出；然后，我展示经济的文化社会学如何着手研究货币事务中的文化。

第二章将专门聚焦稳定文化及其与独立央行运行之间的关系。我将先提出政治经济学文献中所承认的央行独立的传统资源。接下来，我将介绍目前为止这个领域里的学者和从业者的分析中所不曾提到的文化资源。之后，我将提出一个指导稳定文化研究的三步程序。第一步要求分析者领会在给定的社会里用什么来界定集体认同，以及一旦货币事务一下子变成社会的中心象征，货币与中央银行业务将如何被代表。第二步要求讨论货币事务的象征性嵌入的方式影响货币与央行业务象征性地与中心相联系的可能性。第三步要求分析者从戏剧化的角度解决货币事务，然后对这种联系可以成功地把货币与央行业务移动到中心所依赖的执行环境进行解释。

第三章将解析稳定文化的原型案例，即德国的稳定文化。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的超级通胀经历，货币混乱对魏玛共和国产生的破坏作用，随后希特勒上台并建立纳粹独裁统治，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的破坏与屈辱，以及弥漫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恐惧构成德国加入 EMU 之前建立在德国马克和联邦银行之上的各种含义的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马克成为国家象征，联邦银行成为其监护人。随着德国马克因帮助人们克服最近的历史带来的持续焦虑而在人们中间获得深远的存在价值，联邦银行转化成这种焦虑的制度性解决方法。换句话说，联邦银行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建立起来，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工具而发挥潜在的功能。德国货币事务的象征性嵌入影响了与中心的联系讲得通的程度及其带来的意义和象征性功能。我将在本章阐述在哪些方面是这么回事。当然，为了有效果，联系必须有机会给人表现出真实的印象，这是文化行为的问题。我将特别援引两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个例子是关于 1997 年德国联邦银行与财政部长魏格尔（Theo

Waigel) 之间因为黄金储备的重新估值而发生的冲突。第二个例子是关于德国联邦银行与总理科尔 (Helmut Kohl) 之间因为 1990 年建立东西德货币联盟问题而发生的冲突。在第一个冲突中, 联邦银行胜出; 第二个冲突中, 联邦银行臣服。

讨论完在德国这种具有完备的中心的社會中穩定文化的運行并描述历史上最著名的独立的央行, 即联邦银行及其神圣的货币马克之后, 我将进入第四章讨论一个更不稳定的案例: EMU。这里将讲述一个没有确定的中心, 而且当时几乎忌讳讲出象征性中心的社會, 即欧洲; 和一个新近建立的央行, 即 ECB; 及其相对世俗的货币, 即欧元。通过对比欧洲与德国的案例, 有可能说明欧洲穩定文化出现的复杂性。和之前的案例一样, 我将在此案例中阐明货币事务中象征性嵌入与文化行为的作用。

讨论完分析谱系的两极端, 即德国和 EMU 之后, 我将在第五章讨论穩定文化在特别情况下如何表现。为此我将聚焦美国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美联储用前所未有的货币扩张政策回应危机, 鉴于美国经济经历了特别的情况, 美联储为其做法找到理由。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 只有当公众相信情况的特殊性时这种理由才能得到支持, 而这也是一种文化素养。解决这个问题, 就有可能把穩定文化中调整货币政策制定中的特殊情况的一面揭示出来。

在结语, 我将概括我的论点。批评者经常指责独立的央行自闭, 以自我为中心, 傲慢地坚持对现实按照固执的逻辑进行解释, 而且从结构上无法处理不同的情况。我希望本书将说明, 通过系统地阐述穩定文化在货币事务中的作用, 独立的央行必将摆脱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式。最后, 我将概括地提示一个从本书的首次系统的穩定文化研究中分离出去的可能的研究及其制度议程。

总之, 我将在本书里提出穩定文化包括一整套文化资源和实践, 它们被调动起来就可以把穩定导向的货币制度 (比如, 央行独立和价格/货币稳定的目标) 锚定在国民认同上, 并探索这种联系发生作用的方